写在《反山》(修订本)中英文版出版后

方向明

1986年良渚文化反山大墓和1987年瑶山祭坛,是"七五"期间(1986~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89年)。1986年的反山发掘就是为了迎接纪念良渚五十周年,浙江考古前辈们有目的、有计划的考古工作,因为有了前期浙北地区良渚墓葬发掘的经验积累,以及瓶窑吴家埠遗址发掘和系统考古调查等相关田野考古工作,尤其是江苏、上海同行们的发掘经验和"土筑金字塔"的概念,发掘前不但明确反山"可能是一处良渚文化的墓葬,即'土筑金字塔'",还制订了详细的《余杭县长命乡反山良渚文化墓葬发掘细则》。1986年5月8日至7月5日,9月3日至10月10日反山发掘取得石破天惊的收获,其中上半年的发掘收获由领队王明达先生执笔,及时发表在《文物》1986年第10期,"对于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阶级、国家的出现等重大历史课题具有重要意义"。随后,《文物》1988年第1期以最快速度刊发反山、瑶山两地考古简报,"反山墓地所出现的这些因素,对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具有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

反山发掘在玉器组合关系、玉器功能、玉器图像,以及葬具和葬仪复原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收获。反山、瑶山考古发掘,将良渚文化的发现推向新的高潮,玉器的大量发现,不仅丰富了良渚文化的研究内容,而且成为在更深层次上探索良渚文化的突破口。反山、瑶山发掘丰富和充实了对良渚遗址群的认识,一处后来称之为"莫角山遗址"、性质类似某种政治或宗教、文化中心,人工堆积工程的"中心遗址"被发现(牟永抗:《浙江新近十年的考古工作》),成为良渚遗址群考古的重要时间节点。

1990年11月"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副主任任式楠,就反山、瑶山等良渚考古重大发现,精辟地指出"良渚中、晚期的成批玉器,已是早期礼器和礼仪制度的代表物","神人形象的标准化,意味着广大区域内已被人们共同崇奉,是主神。统一的神是因有相应的王的存在并加以神圣化的结果。这时已借助宗教作为加强政治统治的一种途径"(《考古》1992年第6期)。成组玉礼器的出现被认为是东亚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玉和玉器的观念是中华古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1990年牟永抗、吴汝祚先生开始系统全面地从中华文明起源角度出发,阐述"玉器时代"是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牟永抗考古学文集》2009年)。

1996年严文明先生撰文,认为像反山M12"这样的人物当然很像是最初的国王,而同葬于一个墓地中的贵族当为王室的重要成员"(《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以莫角山城为代表的良渚遗址群既是良渚文化中最大的中心,是不是就可以看成是整个良渚文化的中心呢?假定莫角山城是某个统治集团的权力机构所在地,是否就可以称为都城?反山墓地是否就可以称为王陵?"(《文物》1996年第3期)。

反山发掘时,我还在读大一下和大二上学期,《文物》1988年第1期刊发反山、瑶山简报时,我正读大三下学期。敬爱的曾骐老师通过《文物》月刊张昌倬大师兄给大家买来这一期杂志,使我得以在大学阶段就对反山、瑶山的重大收获和良渚玉器有了很深的印象,这一期《文物》杂志也是我迄今为止阅读次数最多也最认真的一本,一直保留至今。后来在曾老师的悉心指点下,我的毕业论文就以《良渚文化玉器所反映的原始宗教》为题。这篇稚嫩的小文最后刊登在《江西文物》1991年第1期,这也是我第一次正式在文物考古期刊上发表文章。后来彭适凡先生告诉我,小文的编辑是他,这些都是缘分。

所里牟永抗先生写文章,喜欢让年轻人帮他画文内插图,算是交流和培养。这项工作之前交给赵晔做得多,我入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后,因我的考古绘图画得很快,也画得较好,协助牟先生画图和誊稿的工作就慢慢让我来承担了。我的绘图也得到了反山、瑶山发掘报告负责人王明达先生和芮国耀的肯定。1991年前后,王明达先生、芮国耀告诉我,他们计划整理反山、瑶山发掘资料,要我参加。不过迟至1998年瑶山的整理才开始,我协助芮国耀在吴家埠工作站一鼓作气绘制完瑶山所有出土器物图和遗迹图。

2000年曹锦炎先生担任第四任所长后启动反山发掘资料整理,王明达先生提议并经曹锦炎所长决定,由我协助王老师整理反山,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画图,曹所长还特别关照时任良渚工作站站长刘斌,不要给我安排其他工作,以便能专心致志完成反山考古报告插图绘制工作。反山绘图工作从2001年上半年开始,因为期间还要整理良渚庙前遗址,断断续续延续到下半年才基本完成,前后大概四个月。在整理反山M19时,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残墓的墓底,反山M21应该是晚一阶段的墓葬,反山可能存在晚一阶段的土台,简报提到的灰黄色较坚实的"封土层",极可能是晚一阶段的土台堆积,另外反山遗址南北和东部范围也需要做些考古调查和勘探。

在王老师的支持和曹所长的首肯下,2002年10至11月,我和方忠华对反山剖面进行了重新铲刮,并打了4条点到为止的小探沟,确认了晚一阶段土台堆积的存在,并基本确定了反山遗址的范围。鉴于1997年瑶山后续发掘清理了当年遗漏的M14,我和方忠华在反山关键柱(2米×2米)东侧有目的地打了一个探眼,在距当时地表50厘米下带出陶器残片,应该是墓内随葬器物。非常遗憾的是,后来为了申遗展示,他们把这个屹立三十多年不倒的关键柱推平了,失去了反山墓地最原始的中心标高,据刘斌告知,在清除关键柱后,他们确实发现了墓坑迹象。现在反山遗址已经覆土加高做了模拟展示,盖了大棚,真实情况不得而知了。

反山是一处现存主体为东西向的大土墩,反山东部尚未发掘,是墓地还是房子?2002年反山调查时,我们选取东西南北进行了小规模钻探(Z1-Z6),其中东西向钻探发现较多的红烧土颗粒,结合江阴高城墩遗址西部为墓地、东部为房子的聚落模式,以及高等级墓地一般墓葬数量在10-20座左右的规律,我认为反山以M12为核心的墓地基本完整,相应的反山东部是房子的可能性极大。

2002年上半年和下半年我还协助王明达先生进行了塘山(金村段)发掘和塘山(毛元岭—河中段)调查试掘,2003年又负责海宁杨家角遗址后续和长兴卞山古墓葬发掘,把《反山》报告交给文物出版社已是2004年了。在张昌倬老师的安排下,编辑王霞付出了巨大努力,记得2005年8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展》,王霞还专门跑到开幕式现场,向我追问报告二校的细节问题。2005年10月《反山》正式出版,不过见书已经是2006年了,以至于遗憾地错失申报2005年度和2006年度"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的机会。

王明达先生在《反山》第三章结语中,对反山玉器进行了全过程的阐述,强调考古学方法是研究古玉的前提,确定"考古学单元"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之一,反山发掘非常注意每一座墓内随葬玉器的位置和配伍关系,神人兽面像在良渚文化分布区具有强烈的族群认同和神权之上的意义。"以玉这种重要资源的控制,生产过程的复杂化劳动,到按占有者的身份、地位、等级高下的分配,无不反映了良渚文化社会组织处于一种有效而有序的状态之中。玉本身所具备的特殊的自然属性和玉器所集中体现的政治上的以及观念上的社会属性,在中华文明形成进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反山》修订本第387页)

严文明先生在《中国文物报》2006年7月12日发表《一部优秀的考古报告——〈反山〉》,给予《反山》高度评价,说反山发掘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考古发掘,"是一个具有科学预见性的战略性决策","就是有明确的课题意识和学术目标"。严先生对报告全面如实地报道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注意总结田野工作经验尤为肯定。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顺利通过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间,伦敦剑桥大学科林·伦福儒先生向我们建议应该把良渚重要考古报告翻译成英文,以便更多的人了解良渚。在良渚遗址申遗过程中,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委员会曾组织翻译《反山》《瑶山》等考古报告作为申遗基础材料。2019年3月,我向时任所长刘斌提出正式出版英文版的计划,得到刘斌所长和《反山》报告负责人王明达先生、《瑶山》报告负责人芮国耀先生的支持。

作为持续扎实做好良渚古城遗址和良渚文化考古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2020年在浙江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反山》《瑶山》等良渚遗址群重要考古报告英文版的出版,与"良渚文明丛书"、"世界古文明译丛"、《良渚文化玉器全集》等,正式纳入"良渚考古图书出版"项目。由于《反山》《瑶山》两本报告已出版多年,组织翻译英文版时,自然涉及对中文原版的重新校勘,尤其是反山M14因为整理时遗漏一张野外平面图,使得不少玉器在图上未标出土位置,加上中文原版存在一些错误和必要内容的修订,由本人负责中文原版、陈明辉负责英文版,在朱叶菲、夏勇等的协助下,在编辑黄曲、崔叶舟的辛勤劳动下,2021年至2022年,《瑶山》(修订本)中英文版、《反山》(修订本)中英文版由文物出版社顺利出版。此外,《良渚王国》英文版也已正式出版,《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卞家山》《文家山》英文版则正在编辑出版中,将陆续面世。

1977年李济《安阳》英文版由华盛顿大学出版,2011年《庙底沟与三里桥:黄河水库考古报告(汉英对照)》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相对于博物馆领域对外宣传,考古报告英文版明显落后。我觉得这些具有中国考古学重要里程碑意义的考古报告,具有反映古代中国重要物质文化和精神成就的考古报告,应该出版双语,这是助力重要考古工作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讲好中华文明故事,考古工作者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也是我们努力的出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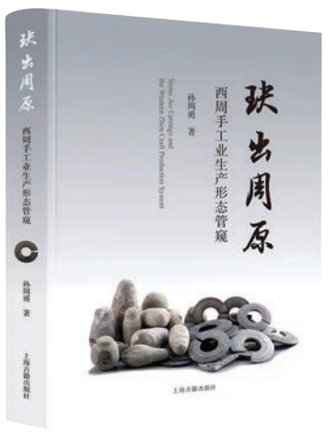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反山》(修订本)
编著: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月
定价:698元

《FANSHAN》
编著: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定价:780元

《玦出周原——西周手工业生产形态管窥》序言

刘莉



孙周勇博士即将出版新作《玦出周原——西周手工业生产形态管窥》,嘱我作序。阅读之中,时时回忆起近20年前周勇在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考古系攻读博士时的往事。书中大部分章节所叙述的田野发掘和研究工作都基于他的博士论文,而这样巨大的工作量是他在短短的三年之中完成的。当年考古系的老师们都对他的高效工作有着很深的印象。这部新作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的发展和完善,加入了不少近年来新的考古资料和理论分析。这部著作涉及西周考古和历史研究中很多方面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它尤其在考古学研究中对中国早期城市化进程的理论与实践有非常重要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城市起源的理论:手工业生产在中国早期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周原的历史包括了一个从先周时期前国家政治体系发展到西周时期大型都城的过程。因此,对周原遗址的研究首先涉及的理论问题就是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和性质。关于城市起源的理论,考古学研究主要受70年前柴尔德所提出"城市革命"这一概念的影响。在他所列举的衡量城市出现的十个标志中,最先强调的是人口集中的大型聚落和专业化生产和分工的出现,其中包括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柴尔德认为,城市与乡村有人口结构的区别,虽然大部分居住在城市的人口仍然是农民,耕种附近的田地,但是城市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包括专业手工业生产者、商人、管理人员和神职人员等。因此,城市不同于之前的聚落在于从事生产活动人口的分化。值得注意的是,柴尔德在提出城市革命这一概念时,并未包括中国的考古学资料。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在讨论中国早期城市起源问题时,主要关注中国早期城市的礼仪性和政治性功能。例如,维特利认为商朝最早的城市是礼仪活动场所和行政中心,主要由王室人员、神职人员和一些精选的工匠居住。张光直认为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罗泰曾将早期中国城市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初始期,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城市聚落;形成期,青铜时代早期的王室贵族世系的聚集地;进展期,青铜时代晚期的城市。在这个发展序列中,西周处于第二阶段,其城市(包括周原)的基本特征为分散的贵族宗庙或宫殿建筑群,周围分布着杂乱无章的半地下式房屋建筑。这些观点虽然揭示了中国城市起源的某些特点,但现在看来并不全面;却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考古工作长期以来侧重于发掘大型宫殿和墓葬遗存的倾向和由此造成的原始资料偏差。其结果是导致我们缺乏对早期城市中所存在多样化的生产活动和生计方式的了解,因而限制了对中国古代城市化进程,尤其是对早期都城功能的全面分析。可喜的是,近年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更加注重聚落形态、手工业生产以及器物功能等方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对中国早期城市化进程有了新的认识。

周勇的这部著作正是这个新研究方向的一个优秀实例。他打开了一扇窗口,使我们可以窥视到三千年前西周城市中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侧面:在周原,与大型宫室和宗庙建筑共存的,还有依附于贵族的手工业生产作坊和工匠们生活和生产留下的遗迹。书中对周原齐家遗址石玦生产的技术和规模,以及工匠们社会身份等级等方面的分析,提供了研究早期城市中手工业生产的详细的考古学第一手资料。它向我们展示,周原作为西周早期的都城,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

第二,研究古代手工业生产的理论与方法。齐家石玦作坊遗址反映的生产组织和生产过程是本书的核心内容。西方考古学对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有多年的研究,颇有建树。周勇在分析齐家石玦生产过程时也借鉴了这些理论模式和分析方法,但他并没有拘泥于原定义,而是根据周原的发掘资料对原理论模式进行了检验和深入探讨;同时,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料,对理论框架补充了生动的例证。书中对于周原齐家作坊这类制造一般民用品的手工业生产组织的性质问题的讨论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根据以往的一些理论框架,早期国家中的手工业生产组织有多种方式,其中代表等级身份的奢侈品生产一般都由王室贵族掌控,而一般民用产品的制作则由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者承担。周勇在书中检验了这一假设。他结合考古遗存背景,对出土物进行量化分析,广征博引文献材料,并结合周原出土的其他建筑基址和作坊遗存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手工业生产已经成为周原贵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们可以推测周原手工业生产系统是处于贵族家庭掌控之下的、依附性的,既生产奢侈品又生产日用品。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手工业生产活动也是西周王朝实现政治统治的经济基础。"这一结论对研究西周都城的性质十分重要。

第三,周原都邑发展历史的考古学检视。长期以来考古学家将周原定性为周王祖庙所在以及王朝贵族的聚集地。但近年来陆续发现和发掘了多处手工业生产遗迹,因此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西周手工业生产中的商业性质,以及手工业生产者的身份和来源,齐家石玦作坊的研究是其中之一。这些研究揭示,西周时期突然出现在周原的大量工匠为商遗民,是他们将旧王朝创造财富的先进技术介绍给新王朝的统治者,同时也保障了这些技术的持续发展。这对我们了解城市发展初期的人口结构尤为重要,也对中国早期朝代更替时生产技术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的延续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从周勇的著作中,我们看到周原的发展历史正反映了这样一个朝代更替时在都城所发生的人口、技术及文化特征的转变过程。这些信息无法从零星的文献记载中得到,而考古学研究的长处,正是揭示那些有具体时空关系的物质遗存,为探索人口迁徙、技术传承、社会组织以及物质文化变化过程提供证据。这些对周原城市化进程的认识应该可以用来检验青铜时代早期其他大型都城遗址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城市化的特点,并以此进行跨文化对比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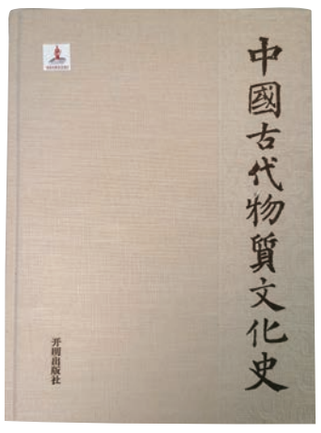
最后,我想强调,考古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既需要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帮助选择命题和研究方向,也需要在发掘的基础上运用实验考古和自然科学分析方法进行协助和检验,而丰富的古代文献也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周勇的这部著作正是这样一个多学科相结合研究的典范。

《玦出周原——西周手工业生产形态管窥》
作者:孙周勇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定价:98元

中国传统家具的迤逦诗卷

——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家具卷》

夏岚



由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袁进东教授、故宫博物院周京南研究馆员、中国高等教育家具专家胡景初教授三人共同撰写,开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家具卷》(以下简称《家具卷》),是一部全面系统、深入讲述中华民族传统家具历史发展的图书。本书以文物考古实物、文献资料为研究基础,从我国传统家具的品类、材质工艺、结构装饰、风格流派、地域文化、民族特性等层面进行论述,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全书篇幅约23万字,精美图片近400幅,是中国传统家具的迤逦诗卷。

《家具卷》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系列书中的重要部分。系列书集合目前国内顶级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进行编写,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诠释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同时,注重物质的客观性和系统关联性的学术视角,在学术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华夏大地,大量完整丰富的地上、地下物质文化遗存是中华文明传承和发展的最好佐证,而中国传统家具就是这条文化项链中,最闪耀的一颗珍珠。然而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和其他物质文化一样,没有一部全面系统基于实体的家具文化遗存而构建和叙写的中国家具文化史。这本书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和学术空白。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腾飞式发展,对世界经济格局影响举足轻重,这些年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大力发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传统家具行业也不甘人后,他们以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观;物以载道,道在器中的造物文化观;和而不同的设计文化观;才尽其用,材美工巧,大巧若拙,精益求精的工艺文化观,对传统家具进行着全方位的创新。在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传统家具的文化基因、根脉尤为重要。《家具卷》的撰写恰如其时,应运而生,成为复兴中华民族传统家具文化的重大举措。

《家具卷》的撰写手法独特,让人留香,从混沌初懵的史前家具、跬步滥觞的商周家具、漆金和鸣的先秦家具、一席之地的汉代家具、佛文东渐的魏晋南北朝家具、雍容异彩的隋唐五代家具、高潮初音的宋代家具、朔漠风华的辽金元家具、笑傲江湖的明代家具到盛世佳器的清代家具,一幅辽阔澎湃、浪漫飘逸的中国传统家具历史画卷,仿佛在读者眼前徐徐展开。

《家具卷》对明代家具有着这样的文字描述:"世界的东方艺术有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那就是明式家具。其弦音绵绵数百年而不绝,文徵明那棵亲手种下的紫藤,与紫藤斑驳疏影下的那把官帽椅依然在一起,是那样的和谐,大自然的美,人造物的美,一个张扬热烈,一个内敛矜持,这一静一动,这一放一收,全然把周围的观者给忘了,这就是明式家具,一眼万年。之前各朝代家具的积累沉淀,最后只为成就她。这,就是中国家具发展的高潮阶段。喧嚣澎湃,像海面的朝阳一样,喷薄而出。她有极简的细条,是世界上最早的'少就是多',她有最生动的纹理,里面有山、有水、有云,当然,还有数不尽的文人雅事。她有最精巧的结构,不用一颗钉子,榫的阳刚和卯的阴柔,在家具上做了最好的结合。古人认识和诠释宇宙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全部浓缩到了一件家具上,这是何等的了不起。这不是高潮,又是什么?"

《家具卷》以考古文物和历史文献为基础,结合唯美的文字表述,将中国传统家具文化向我们娓娓道来,余音绕梁不绝。

《家具卷》以完整的物质文化体系呈现,极大地强化了中国家具体系的世界地位。目前的世界家具体系中,只有两种文化创造了对现代家具设计影响巨大的家具体系。一是西方家具体系(包括北美家具),另一是东方家具体系,即中式家具体系(包括日本和韩国家具)。中式家具体系是世界两大主要家具体系之一,在不同时期对现代家具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对欧洲家具体系的发展,都作出过巨大贡献。方海先生的《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中国主义》一书中,以大量案例和史料对此作出了有力的论证。《家具卷》对中国传统家具的历史发展有着详尽的阐述,更有效地展现了中式家具体系的完整性,更有效地强化了中式家具体系的世界性。

《家具卷》将进一步扩大中国传统家具的国际影响。方海先生曾断言:在中国传统家具系统中所蕴含的丰富理念,为当今世界家具的主流成就提供了基石。而中国传统家具,则为众多的现代座椅,提供了设计原型或原则……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家具文化的海外影响巨大,古已有之。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各国的考古学家、探险家、传教士以摄影图片、研究报告和专业论著的方式,向西方世界展示了包括家具在内,中国古代社会壮丽的生活画卷。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传播是被动的,是掠夺式的。另外,早期这一类关于中国传统家具的图集或专著都是外国人编写的。

《家具卷》与上述著作相比较,对中国传统家具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超越以往的专著,如果将来有英文版出版,对中国传统家具的海外传播必将发挥积极的影响,其作用将更为巨大。

《家具卷》也许还能进一步唤起我们珍视民族的历史、热爱和保护家具文物的意识。一个爱护文物、爱护历史文化遗产、珍重历史的民族,才是一个有未来的民族。

(作者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中国传统家具研究创新中心)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家具卷》
作者:袁进东、周京南、胡景初
出版社:开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0月
定价:150元